



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(2011計劃)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青銅器與金文

第五輯

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（2011 計劃）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“金文與青銅器研究”平臺集刊

青銅器與金文

第五輯

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青銅器與金文·第五輯 /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
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20.12

ISBN 978-7-5325-9825-0

I. ①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青銅器(考古)—中國—
文集②金文—中國—文集 IV. ①K876.414-53
②K877.34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20)第 237975 號

青銅器與金文(第五輯)

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5.75 插頁 5 字數 325,000

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9825-0

K·2933 定價: 8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青銅器與金文》

第五輯

顧問：李學勤 裘錫圭 李伯謙 林 澧

編輯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，帶*者爲本輯執行編委）：

朱鳳瀚 李 零 何景成 周 亞 陳 絜

陳英傑* 張昌平 董 珊 劉 源 韓 巍

主 編：朱鳳瀚

編輯助理：劉 麗 楊 博 趙慶森 [捷]石安瑞 楊 坤


封面集字：王 鐸

目 錄

清華簡《攝命》與牧簋、冉盃對讀	[美] 夏含夷 / 1
從盤龍城商代墓葬隨葬銅器看商代早期器用制度的形成與特點	曹 璋 / 6
試論古代青銅器中的隨葬品	吳鎮烽 / 21
多鈕鏡的隨葬方式及其含義	[韓] 李清圭 / 47
鄭州商城鑄銅遺址與出土青銅器探究	蘇榮譽 / 58
談青銅器“私名”的定名問題	陳英傑 / 109
肅卣之邑與《嘗麥》年代新證	張懷通 / 117
不其簋爲秦器說獻疑	[韓] 李裕杓 / 126
東周人物畫像紋銅器研究	張 經 / 142
河北涉縣李家巷銅豆及其他問題	張 翀 / 159
上海博物館藏籛戈	韋心滢 / 170
中山三器銘文的敘事特點與啓示	朱 贏 / 175
青銅樂器銘文敘事元素探析	孫思雅 / 187
談東周時期(公元前 771—前 256 年)個人衛生的社會意義	[德] 金秋月 / 201
先秦時期“鄙”字指代的空間範圍及其對商周國家結構的啓示	謝能宗 / 224
子犯編鐘銘文“俾朝王”史事新解	[美] 宣 柳 / 241

清華簡《攝命》與牧簋、冉盥對讀

[美] 夏含夷*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捌)》收錄有整理者題作《攝命》的一篇簡文,內容是某位周王册命其侄攝“出納朕命”。整理者推斷,《攝命》是古文《尚書·囧命》篇原文,並提供了種種證據以證明“攝”和“囧”是字形相近而產生的訛誤。《攝命》篇“攝”字寫作,即“𠄎”,與郭店簡《緇衣》字形一致,可是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《緇衣》裏,相關的字却寫作“囧”。另外,在《囧命》篇裏,受命者為“囧”,可是在《史記·周本紀》裏,同一個字則寫作“𠄎”。“𠄎”與“𠄎”相近,“囧”與“囧”相近,因此“攝”和“囧”應該指同一個人。不過,與《書序》和《史記》說《囧命》的囧是周穆王時代的人物不同,整理者論證《攝命》受命者“攝”(《廣韻》書涉反,葉部韻)是“燮”(《廣韻》蘇協反,帖部韻)的假借字,據《史記》和《竹書紀年》記載,燮是周夷王名字,周夷王是周懿王的兒子。然而,這兩代之間的繼承並不是連續的,在兩者之間尚有周孝王。在西周歷史上,這樣的王位繼承非常獨特,恐怕反映出周王朝當時的某種問題。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可知,孝王是周共王之弟,而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和《世本》稱孝王是懿王弟。如果孝王是懿王弟,夷王乃是他的侄兒。如此,册命攝的周王應該是周孝王,亦即廣續懿王為天子的周王。雖然學術界對整理者的結論不無異議,可是大多數學者都同意這種解釋相當符合《攝命》的歷史背景。本文也採取這個說法作為討論的大前提,希望提出更多的證據,以說明《攝命》篇內容確與孝王時期的歷史背景存在不少相同的地方。倘若誠然如此,不但更能證實《攝命》應該是這一時期的作品,而且可為深入了解當時的歷史環境提供某些新的視角。

如前所言,周孝王的繼位問題顯得相當例外。與其他父死子繼的諸王不同,孝王不是懿王的兒子,而是他的叔叔或者弟弟。關於懿王在位期間的情況,《史記·周本紀》只說:“共王崩,子懿王艱立。懿王之時,王室遂衰,詩人作刺。”無論如何,所謂“王室遂衰,詩人作刺”,僅能反映出周王朝此時面臨着某種危機。而《竹書紀年》針對懿王在位期間則有頗多記載:

懿王(名堅)元年:丙寅,春正月王即位。天再旦于鄭。

七年:西戎侵鎬。

十三年:翟人侵岐。

* 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;南開大學特聘講座教授。

十五年：王自宗周遷于槐里。

十七年：魯厲公擢薨。

二十一年：虢公帥師北伐犬戎，敗逋。

二十五年：王陟。

根據中國史學界的常識，今本《竹書紀年》是明代的偽造品，不應該作為歷史證據。然而，另一個常識是懿王元年“天再旦于鄭”的記載實有其事，屬於信史的範疇。不過很少有史學家說明，如果“天再旦于鄭”是信史，那為什麼其餘諸條却是偽作。在筆者看來，《竹書紀年》懿王七年、十三年和二十一年都記載王畿屢次受到外來的侵略，這與《史記》所言“王室遂衰”的境況相當符合，更能揭示出西周王朝危機的具體細節。在二十五年“王陟”記載以後，今本《竹書紀年》附加了一個注解（可能是晉人荀勗所加），謂“懿王之世，興起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壺氏不能共其職，於是諸侯攜德”，適可有助於認識這一情形。

《竹書紀年》懿王時代另一個記載，謂“十五年：王自宗周遷于槐里”。美國漢學家倪德衛（David S. Nivison）曾經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，即懿王此次“遷于槐里”，可能正如“厲王奔彘”那樣，實際是周王自都城逃走。在這樣的危機下，周孝王才即位來代替前者。據《史記索隱》記載，“槐里”又名“廢丘”，也許暗指槐里是懿王廢居的地方。這種政治事件也有利於解釋，為何懿王和孝王時期銅器銘文上出現的年代記載往往相當錯亂，其中某些年代記載的因素，即暗示當時可能存在兩王同時在位。鑒於西周年代學仍然處於未定狀態，所以上述想法當然只是一種猜測，沒有積極證據。然無論如何，周孝王的王位繼承很不正常，這是無法否認的。

若按整理者所言，清華簡《攝命》篇當為孝王時代的文獻，那麼，它恐怕會反映出這個時期的歷史情形。《攝命》是周王對攝的命書，具體內容中提到當時的政治危機。在命令攝“肇出納朕命”以後，王接着說“今民丕造不康”，亦即民衆面臨不平安的情況，官員好像也遇到或製造了不少問題：

王曰：“攝，今余既明命汝曰：肇出納朕命。虞。今民丕造不康，□□□怨，掣四方小大邦，掣御事庶百又告有吝。”【3—4】

以後，王還指出“四方大羸”，大意是老百姓沒有飯吃，對官員也缺乏信任：

有曰：“四方大羸，亡民亦斯欽我御事。”【7—8】

上文提及“我御事”，即王朝官員似乎是引發此次危機的一個原因。王命攝不要參與官員的黨派，強調當時的官員已經“異厥心厥德”，意味着王和官僚群體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矛盾：

“汝毋敢朋酗于酒，勿教人德我。曰：毋朋多朋，鮮唯胥以夙夕敬，罔非胥以墮愆；鮮唯胥學于威義德，亡非胥以淫愆。”王曰：“攝，余辟相唯御事，余厭既異厥心厥德，不延，則俾于余。”【16—18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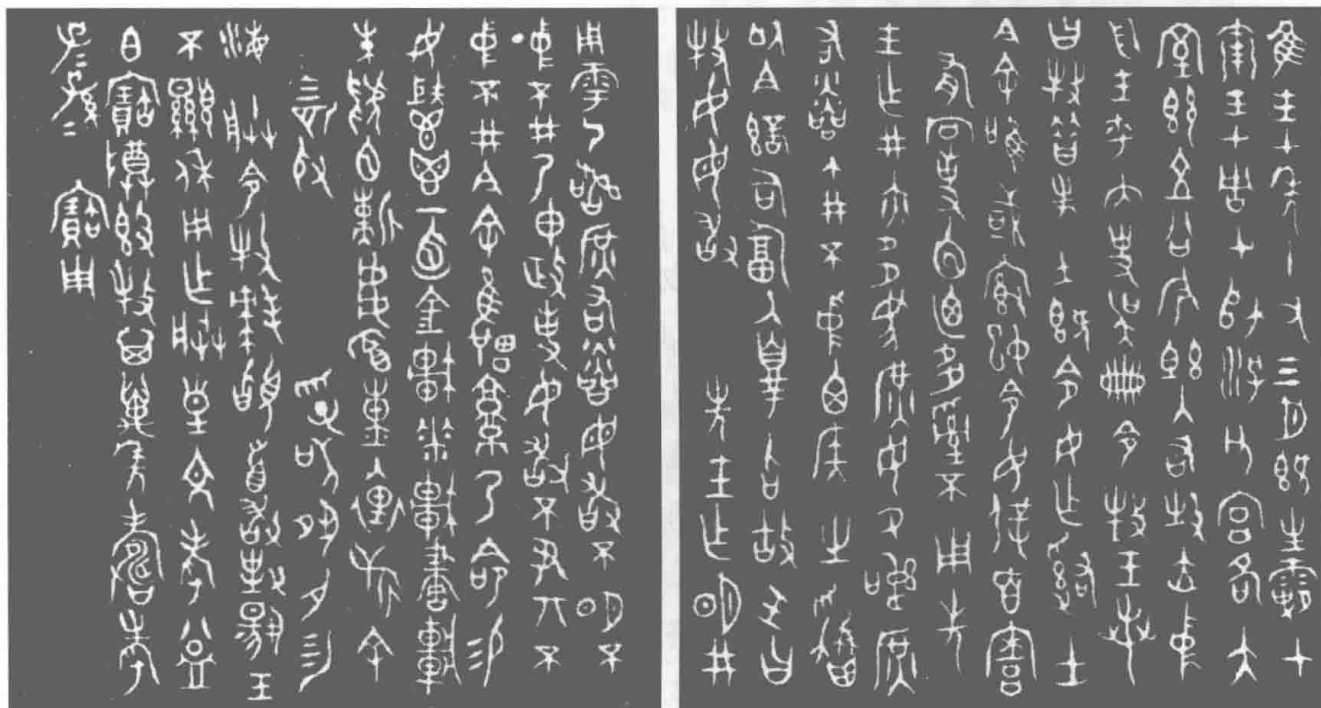
王還叫攝在管理人民的時候，不要“受幣”，暗示其他的官員已有這樣的行為。

“凡人有獄有訟，汝勿受幣，不明于民，民其聽汝。時佳子乃弗受幣，亦尚反逆于朕。凡人無獄亡訟，迺唯德享，享載丕孚，是亦引休。汝則亦受幣，汝迺尚祇逆告于朕。”【21—23】

上文描述的政治危機，究竟與西周什麼時代比較切合？我覺得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懿王“自宗周遷于槐里”、孝王在鎬京代其為王的階段。有幾件銅器銘文應該是孝王時期鑄造的，可以說明當時的政治問題。牧簋是北宋年間發現的銅器，以後失傳，但著錄於呂大臨的《考古圖》一書中。雖然器型和銘文只有摹本，可是完全可以窺見該器的原樣。



牧簋器影



牧簋銘文摹本

牧簋銘文所見完整的年曆信息，與西周中期偏晚的師晨鼎和諫簋的年代記載是一致的，應該屬於同一個王世，但與共、懿、夷三王可以復原的金文曆譜都無法吻合。因此這三件銅器可以歸入孝王時期，大概沒有疑問。牧簋銘文可以隸定如下：

佳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，王才周，才師湯父官，各大室即位。公尹組入右牧，立中廷，王乎內史吳册令牧。王若曰：牧，昔先王既令女乍司土。今余唯或廢改，令女辟百寮。有同事包，迺多亂，不用先王乍井，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隣。不井不中，迺侯之藉人。今既司甸厥辜召故。王曰：牧，女毋敢弗帥先王乍明井，用于乃訊庶右隣。毋敢不明不中不井，乃政事。毋敢不尹其不中不井。今余佳申重乃命，易女秬鬯一卣、金車、賁較、畫轄、朱虢、鞞靳、虎鬣、熏裏、旂、余馬四匹。取□孚敬夙夕勿廢朕令。牧拜稽首，敢對揚王不顯休，用乍朕皇文考益白寶尊簋。牧其萬年壽考，子子孫孫永寶用。

銘文開頭同於常見的册命金文，在年代記載之後，周王命令牧管理“百寮”，亦即王朝官僚群體。然而，王接着批評官員，指責他們“多亂”，對待百姓也不够公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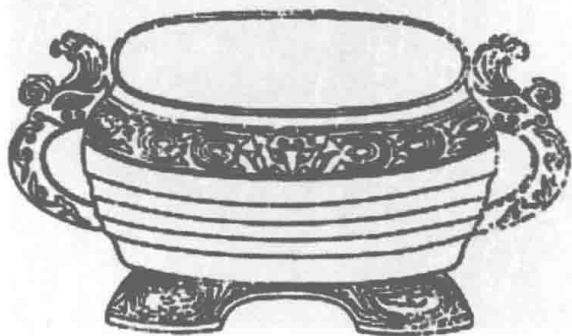
令女辟百寮。有同事包，迺多亂，不用先王乍井，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隣。

王任命牧管理訴訟，似乎暗示“百寮”存在“不中不井”的弊端：

牧，女毋敢弗帥先王乍明井，用于乃訊庶右隣。毋敢不明不中不井，乃政事。毋敢不尹其不中不井。

這與《攝命》所見周王命攝“凡人有獄有訟，汝勿受幣”的情形頗為相似。

另一件銅器冉盨也是北宋時期出土的，後亦失傳。冉盨載有長篇銘文(151字)，但目前僅見册命金文的後半部分，不知其前半部分是載於器蓋抑或另一件銅器上面，因而册命的具體時間和王朝官員的名稱信息，我們都無從得知。由於冉盨與毛公鼎銘文在內容上略有相似性，過去研究者往往將其年代定為西周晚期。然而現在看來，冉盨與牧簋銘文的共性因素更多，它很可能也是西周中期晚段的銅器。



冉盨器影



冉盥銘文摹本

冉盥這一部分的銘文可以隸定如下：

又進退，于邦人、足人、師氏，人又臯又故，迺駟朋即女，迺繇宕卑復虐逐厥君厥師，迺乍余一人咎。王曰：冉，敬明乃心，用辟我一人，善效乃友內辟，勿事暴虐從獄，爰奪戲行道。厥非正命迺敢疾訊人，則唯輔天降喪，不口唯死。易女秬鬯一卣、乃父市、赤鳥、駒車、賁較、朱號、鞞靳、虎鬲、熏裏、畫轉、畫轄、金甬、馬四匹、鑿勒。敬夙夕勿廢朕命。冉拜稽首，敢對天子不顯魯休，用乍寶盥，叔邦父、叔姑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。

因為該銘只保存有後半部分，比較難懂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其命辭也透露出當時的執事官員給周王製造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，從而形成了某種困難的政治局面，即“迺繇宕卑復虐逐厥君厥師，迺乍余一人咎”。同時，周王也命冉遏制腐敗獄訟的負面影響，即“勿事暴虐從獄，爰奪戲行道”。凡此都與牧簋甚為相似，兩者所指很可能正是同一場政治危機。

鑒於冉盥目前僅存器影和木板摹本，而且銘文的前半部分闕如，所以我們對其年代只能略作上述推測，志此以為旁證，以供專家深入研究。不過，牧簋似乎可以定為孝王銅器，應該沒有問題。如果說，牧簋銘文和《攝命》命書所描述的對象確係同一場政治危機，那麼，這也可以作為清華簡整理者對《攝命》年代推定的旁證。筆者深知這樣的論證近乎一個邏輯循環，並無鐵證可言。然而，通過聯繫出土簡帛文獻、傳世典籍和銅器銘文進行西周史研究，相關探索也許不無啟發。

從盤龍城商代墓葬隨葬銅器看商代 早期器用制度的形成與特點

曹 瑋*

盤龍城遺址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，不僅發現了城址、大型建築、鑄銅遺址等，也在盤龍湖周圍的李家嘴、楊家灣、王家嘴、樓子灣、小王家嘴、楊家嘴等地發現了多處商代早中期墓葬。《盤龍城》報告的作者將遺存分爲七期，時間相當於二里頭二期至二里崗二期晚段；^[1] 進入 21 世紀後，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新的調查和發掘工作，^[2] 根據盤龍城的新舊材料和近年來商文化研究的新成果，孫華對盤龍城材料進行了梳理，對盤龍城的分期進行了調整，將分期調整爲三期：

第一期：爲原報告的一、二、三期，相當於二里頭四期至二里崗下層晚段偏早；

第二期：爲原報告的四、五、六期，相當於二里崗下層晚段至白家莊期或稍後；

第三期：原來的第七期，時間相當於洹北商城時期，包括殷墟早期。^[3]

應該說新的分期不僅更能貼近盤龍城器物的變化，將時間延後至殷墟早期更是近年來中商研究的成果。盤龍城的資料充足而豐富，較好地反映了商代早期器物的演變和發展，也見證了商代早期器用制度形成的過程，所以通過梳理盤龍城隨葬銅器，可以探索商代早期器用制度以及整個商代文化。有疏漏不確之處，敬請方家批評指正。

就商文化而言，目前多數學者認爲，商文化是以下七垣文化爲主體發展而來。^[4] 商人原生活在河北南部、河南北部一帶，因爲氣候逐漸乾冷，被迫沿着太行山東麓走廊向南進入中原。^[5] 在先商文化中只發現了小件銅器，如河北任丘啞叭莊遺址發現一件銅刀殘柄，^[6] 河北邯鄲澗溝村遺址出土了一件銅刀。^[7] 而進入二里崗下層一期時，商人接受了二里頭文

*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。

[1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盤龍城——1963~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[2] 孫卓、陳暉：《盤龍城楊家灣遺址 2006~2013 年度考古發掘收穫》；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盤龍城遺址博物院：《2014 年盤龍城遺址部分考古工作主要收穫》，載《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[3] 孫華：《盤龍城的分期與年代》，載《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[4] 李伯謙：《先商文化探索》，載《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280—293 頁。

[5] 張渭蓮：《氣候變遷與商人南下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06 年第 1 期。

[6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、滄州地區文物管理所：《河北省任丘市啞叭莊遺址發掘報告》，《文物春秋》1992 年增刊，第 178—219 頁。

[7] 孫德海、劉來成：《〈河北邯鄲澗溝村古遺址發掘簡報〉更正》，《考古》1962 年第 12 期。

化的銅器鑄造技術，同時也接受了這種祭祀理念，鑄造的銅器從形制到器類，與其相差無幾。可以說，商人的青銅冶鑄技術是在全面接受了夏人的鑄造技術後建立起來的。

商代早期的考古學遺存是 20 世紀 50 年代發掘鄭州商城時發現的。發掘者認為二里崗的考古遺存年代要早於殷墟，按遺存內涵分為二里崗下層文化和二里崗上層文化；後又進一步分為二里崗下層一期、二期和二里崗上層一期、二期。^[1] 銅器主要集中出土於鄭州商城、登封王城崗等地。1997 年在鄭州商城東北發現的 T166M6 是一座中型墓，出土的銅器有鬲、盃、戈及玉、蚌、骨器和圓陶片；盃的形制與二里頭出土的盃極為相似；鬲的形制與夏家店下層的陶鬲接近（圖 1：1），與二里崗上層的銅鬲比較，無頸部，顯得腹特別深（圖 1：2），所以判斷這是鄭州商城內最早的一座商墓；^[2] 二里頭時期，銅器並未出現鬲的形制，從這件器物來看，銅鬲的形制完全是按照陶鬲製造的，它的出現，是商人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宗教思想之後，把原本自己文化使用的陶器，用在銅質祭祀之器上的開端。盤龍城楊家灣 6 號墓是三期的墓葬，出土的銅鬲（PYWM6：2）當是二里崗下層之物，製作粗糙，無立耳，形制為平折沿，深腹，下腹外鼓，分檔下接較高的三足跟（圖 1：3）。^[3] 另外，這一時期的器物在鄭州市隴海北二街發現的 87M1（出土銅鼎、銅爵和陶器）、^[4] 鄭州商城的東北部宮殿區（東里路黃河醫院 C8M32、C8M7、C8YJM1）、^[5] 以及附近如滎陽西史村（M2）、^[6] 登封王城崗（M49）等地都有發現。這一時期的器物組合為爵、爵盃、爵斝或爵斝盃。在鄭州南關外、紫荊山北還發現了這一時期的鑄銅作坊遺址，出土了多塊爵、鑿、斧等器物的陶範以及煉渣。從目前發掘的遺址與墓葬來看，二里崗下層的青銅器數量較少，從種類和形制上大體上延續了二里頭文化的風格，除了增加了銅鬲以外，其他並沒有大的變化。

二里崗上層文化（三期）時期，是商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，從地域擴張、器物種類增加到器類形制的變化以及紋飾的種類增加，都有長足的發展。地域向西越過西安銅川一綫、到達關中西部，南至長江流域，東南抵巢湖以東的大城墩、東部進入泰沂山脈以東的濟南，北部到達了太行山以北的壺流河流域；^[7] 產生了京當、盤龍城、大城墩、大辛莊、琉璃閣、臺西、東下馮等類型。對這一時期地域的擴張原因，俞偉超先生有很好的總結：“在黃河流域，二里頭

[1]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：《鄭州二里崗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9 年，第 42—43 頁；安金槐：《關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陶器分期問題的再探討》，《華夏考古》1988 年第 4 期。

[2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鄭州商城新發現的幾座商墓》，《文物》2003 年第 4 期。

[3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盤龍城——1963~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221 頁。

[4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鄭州商城新發現的幾座商墓》，《文物》2003 年第 4 期。

[5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鄭州商城——1953~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562—572 頁。

[6] 鄭州市博物館：《河南滎陽西史村遺址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資料叢刊》第 5 輯，1981 年。

[7]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中國考古學·夏商卷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188 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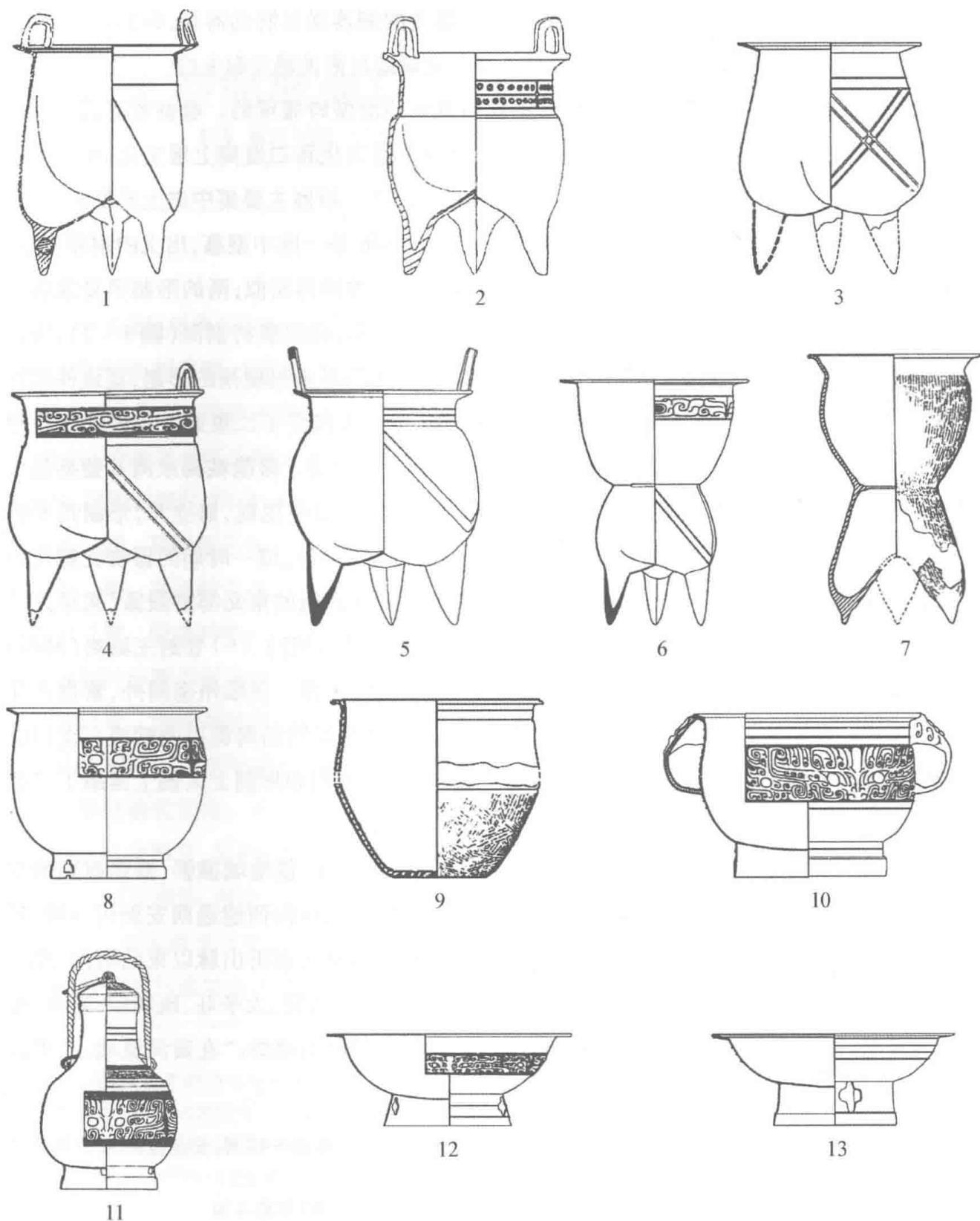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器物圖

1. 鄭州商城 T166M6 : 1; 2. 鄭州商城 T143M1 : 1; 3. 盤龍城 PYWM6 : 2; 4. 盤龍城 PLZM1 : 4;
 5. 盤龍城 PLZM1 : 3; 6. 盤龍城 PLZM2 : 45; 7. 盤龍城 PWZT80⑥ : 2; 8. 盤龍城 PLZM2 : 2;
 9. 盤龍城 PWZT86⑤ : 2; 10. 盤龍城 PLZM1 : 5; 11. 盤龍城 PLZM1 : 9; 12. 盤龍城 PLZM2 : 1;
 13. 盤龍城 PLZM1 : 6

文化之後的商代二里崗時期，也只是二里崗文化才有青銅武器，周圍同時期的其他文化對青銅武器依然闕如。這可以暗示出以下三種情況：第一，二里頭文化晚期之時，商人大概亦已學會鑄造青銅武器的技術，否則恐怕難以戰勝二里頭文化。第二，二里崗文化時期，商人對製作青銅武器的技術，依然像從前一樣，對外實行嚴格保密。第三，二里崗時期的商人，既然壟斷了青銅武器，對於征服四方來說，簡直可以為所欲為。所以，二里崗文化的分布範圍，竟然西至關中，北至靠近燕山一帶，東抵山東的濟南、臨淄附近，南達兩湖的黃陂盤龍城和岳陽銅鼓山。……從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對鑄造青銅武器技術保密的時間，粗略估計，竟然可長達四五百年或五六百年之久。這個新認識的取得，對理解三代文明顯然是大有啟發的。”〔1〕

這一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發展最快的時期，也是商代器用制度形成的時期。縱觀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發展，可以從六個方面反映出來，即器類的大幅度增加、原有器形的變化、紋飾的增加與變化、銅器鑄銘的出現、重器的出現，以及鑄造技術的進步。我們以盤龍城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為主，結合鄭州等地出土的青銅器來闡述這一時期器用制度形成的過程。

一、青銅器類的增加

這一時期是商代青銅器器用制度形成的時期，先後出現了甗、簋、卣、盤、壘、尊等器形，增加的銅器種類超過了以前所有的銅器種類；這些新器形都從陶器發展而來。就盤龍城遺址而言，盤龍城銅器分期的4、5、6、7期，是孫華分期的中晚期，也是盤龍城遺址的鼎盛時期（參見表1）。從表1可以看出：1. 最主要的組合是鼎爵斝，或鼎爵觚斝，從早到晚都是如此。2. 所有新增的器物，都出現在大墓（一類墓）中，可以判定器用制度的形成，是從上層社會開始的。

鬲是二里崗下層時期新出現的器物，在盤龍城一類墓中普遍存在，已經列入一類墓必不可少的隨葬品中了；在2、3類墓中偶有隨葬，並沒有規律；鬲的形制變化及變化幅度與陶鬲的變化相似（圖1：4、5）。

銅甗是首次發現，盤龍城李家嘴二號墓出土的銅甗 PLZM2：45（圖1：6），〔2〕形制與同時期的陶甗（圖1：7）相似，上甗下鬲，連體，這是銅甗的最早形制；甗的出現，當是古人認識蒸汽的產物，除了火燒烤製以外，又認識了“蒸”這一製作熟食的手段；這一時期，商人將其轉化為銅質祭祀器物中，也是增加祭祀程式的需要。同墓出土的簋（PLZM2：2）斜折沿，深腹微鼓，圈足上有三個突狀鏤空，口沿下飾一周獸面紋，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簋（圖1：8）；青銅簋的出現，是否從陶器直口斜腹盆 PWZT86⑤：2（圖1：9）發展而來，我們暫不作判斷，

〔1〕 俞偉超：《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發展背景的新思考》，載高崇文、安田喜憲主編：《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頁。

〔2〕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盤龍城——1963~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61—199頁。

但兩者的形制是十分相似的。稍後的李家嘴一號墓亦出土了一件簋 PLZM1 : 5 (圖 1 : 10), 折沿, 微鼓腹, 圈足, 腹部飾一周獸面紋; 最大的不同就是置雙耳, 雙耳是采用鑄鉚式後鑄方法接上去的。^[1] 簋是盛裝糧食之器; 青銅簋的出現, 擴大了獻祭之物的種類, 使植物類也加入了祭祀上神與先祖的貢品之中。

青銅盤也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器形, 1955 年鄭州白家莊村西發現的 2 號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銅盤,^[2] 是二里崗一期文化之物。盤龍城李家嘴 2 號墓也出土了一件青銅盤 (PLZM2 : 1) 敞口, 寬折沿, 弧腹圜底, 圈足上有十字鏤空, 腹部飾一周獸面紋 (圖 1 : 12); 稍晚的李家嘴 1 號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盤 PLZM1 : 6 (圖 1 : 13)。東周文獻多記載“奉匱沃盥” (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), 在各種禮節中都要盥手, 就是用盤承接洗手之水。盤的產生, 可能是這一時期在祭祀程式上加入了“沃盥”。

壘, 報告稱尊, 是盛酒器中出現最早、延續時間最長的酒器。壘與尊實際上是不同的, 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兩種器物。青銅壘 PLZM1 : 7, 敞口, 束頸, 折肩, 圓鼓腹下斜收, 圈足; 肩部飾一周夔龍紋, 上腹飾獸面紋 (圖 2 : 1)。青銅壘 PLZM1 : 8 折沿方唇, 束頸, 折肩, 圓鼓腹下斜收, 圈足; 肩部飾一周夔龍紋, 上腹飾獸面紋 (圖 2 : 2)。可以看出這兩件青銅壘與陶壘 PLZH8 : 14 (圖 2 : 3) 十分相似, 可知青銅壘是從陶壘發展而來的。報告中稱尊的器物中, 有一類器物當是真正的尊。青銅尊 PLZM2 : 75, 敞口, 微束頸, 折肩, 圓鼓腹, 圈足; 腹部飾一周獸面紋 (圖 2 : 4)。這類尊的發展趨勢是敞口越來越大, 腹部越來越小。與此相比, 青銅尊 PYWM7 : 6, 敞口稍大於青銅尊 PLZM2 : 75, 束頸, 折肩, 腹亦稍小, 圈足; 肩部飾一周夔龍紋, 上腹飾獸面紋 (圖 2 : 5)。這類器物也源於陶器尊, 如雙折肩斜腹尊 PLZM1 : 24, 只不過加個圈足而已 (圖 2 : 6); 在盤龍城樓子灣 1 號墓中出土的硬陶弧腹尊 PLWM1 : 8 已經加上了圈足, 與銅尊的形制就更接近了 (圖 2 : 7), 這兩類器物都源於陶器。報告在陶器上能清楚地區分尊與壘, 而在銅器上却將兩者混淆了。

卣也是盛酒之器, 有學者稱之為壺。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卣與壺並無區別, 約定俗成, 稱有提梁者為卣, 貫耳者為壺。盤龍城李家嘴 1 號墓出土一件卣 PJZM1 : 9, 高隆蓋上有半環形鈕, 器子口, 直頸微束, 圓鼓腹, 圈足; 肩部兩側置半環形耳套接索狀提梁, 提梁上有環鏈與蓋鈕相連, 蓋面與肩部飾夔龍紋, 腹部飾獸面紋。這是商代最早的一件卣。

觚也是這時期產生的器物, 盤龍城四期的李家嘴 2 號墓中就出土了 4 件觚。報告把觚分為粗腰觚和細腰觚, 粗腰觚 PLZM1 : 19, 敞口, 直腰, 鏤空圈足外侈; 腰部飾一周以連珠紋為界隔的獸面紋, 圈足飾對角夔龍紋 (圖 2 : 9)。細腰觚 PYWM3 : 3, 敞口, 弧腰, 圈足外侈; 腰

[1] 蘇榮譽、張昌平:《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》,載萬琳主編:《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,科學出版社,2016年,第118—137頁。

[2]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: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》,《文物參考資料》1955年第10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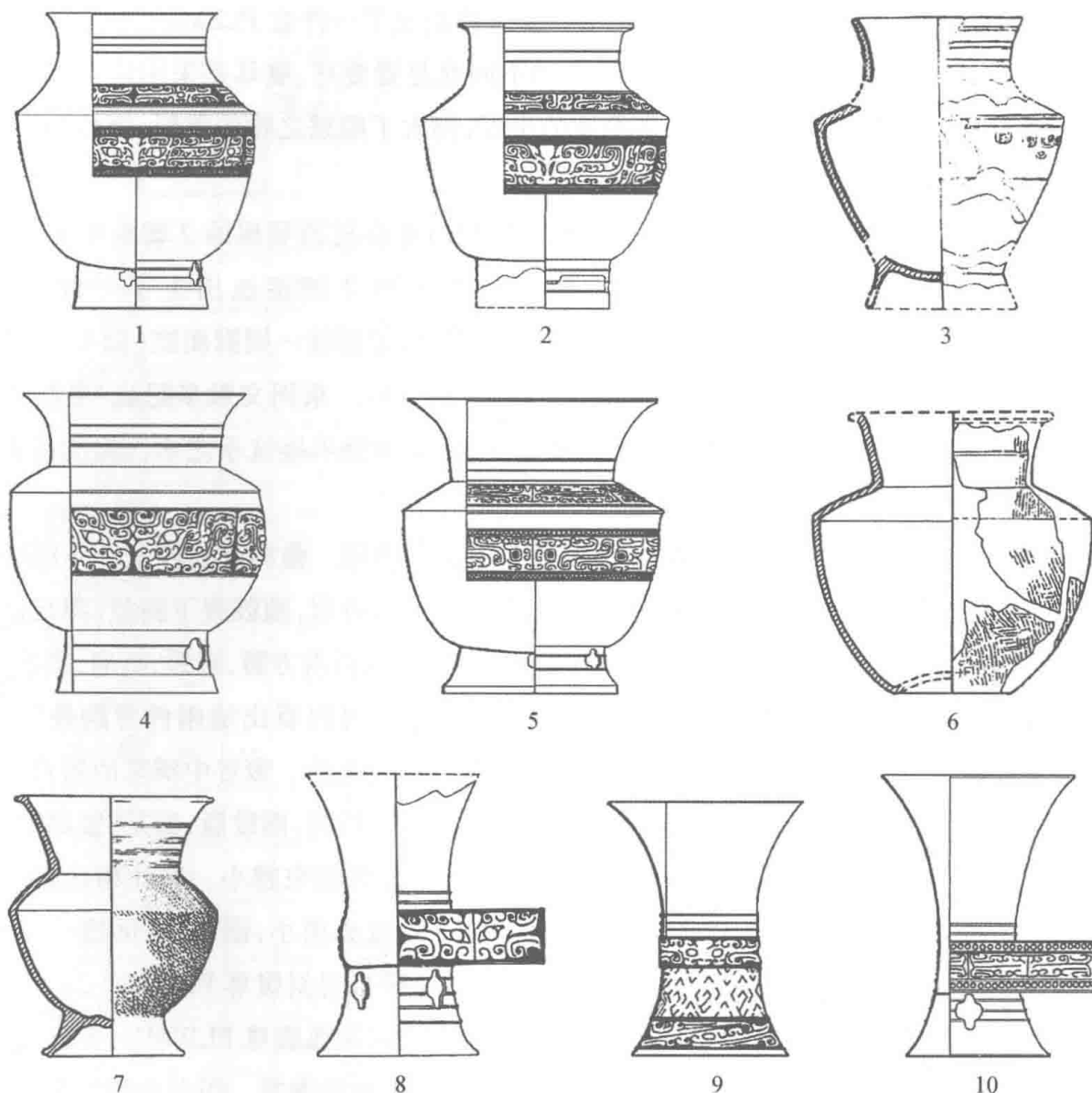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器物圖

1. 盤龍城 PLZM1 : 7; 2. 盤龍城 PLZM1 : 8; 3. 陶罍 PLZH8 : 14; 4. 盤龍城 PLZM2 : 75;
 5. 盤龍城 PYWM7 : 6; 6. 雙折肩斜腹尊 PLZM1 : 24; 7. 硬陶弧腹尊 PLWM1 : 8;
 8. 盤龍城 PLZM2 : 5; 9. 盤龍城 PLZM1 : 19; 10. 盤龍城 PYWM3 : 3

部飾一周以連珠紋為界隔的獸面紋，上下飾弦紋(圖2:10)。無論粗腰、細腰，觚的外輪綫都呈一條大弧綫。而劃為粗腰觚的盤龍城 PLZM2 : 5，口沿殘缺，侈口，長頸，鼓腹，高圈足外侈，上有十字鏤空；中腹飾獸面紋，上下飾弦紋(圖2:8)。這件器物已經脫離了觚的概念，當屬於觚形尊或筒形尊的範疇，也是這類尊最早的形制。

另外，在盤龍城楊家灣17號墓出土了帶鑿觚形器，這件器物造型獨特，橢圓形體，侈口，口部呈燕尾型，兩邊上翹，中間內凹；微束頸，直腹，圈足；寬面的一側置獸面鑿，中腹部飾二周弦紋為界隔的連珠紋，下腹飾一周夔紋；圈足圓形孔下有長方形孔(圖3:1、2)；通高19、口徑13釐米。“兼有爵口、斝鑿、觚身的特徵，器形為過去所未見，根據同出爵斝組